

# 陈省身、吴大任的老师姜立夫

龙飞

姜立夫1890年生于浙江平阳,幼时父母双亡,由兄嫂抚养长大。1910年考取第二批“庚款”留美生。1919年姜立夫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,受聘为哈佛助教。同年10月他的哥哥在家乡突然去世,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,姜立夫立即辞去哈佛的工作,回国料理后事。1921年,他应张伯苓校长之聘,到南开大学创办数学系。

姜立夫知识渊博,讲课得心应手。他从不写讲稿,上课时往往只带一张写着提纲的日历纸。一次,他讲到特别有意思的地方,忽然两脚一并,同时叫了一声:“All right!”(好啦!)随着先生的情绪和动作,学生们受到感染,也都兴奋起来!

对于授课细节,姜先生也很重视。写板书时总是边说边写;在黑板上绘图,也是边画边讲,从不哑场。光线从教室左侧窗口射入,他站在教室的左前方讲授,这样

既面对学生,又便于学生看黑板。他让学生的思路紧紧跟着自己的思路。

数学系1926年的学生陈省身、吴大任成绩最好。姜先生很高兴,又开了些高深课程。吴大任回忆姜先生时写道:“他就像熟悉地理的向导,引导着学生寻幽探胜。使你有时似在峰回路转之中,有时又感到豁然开朗,柳暗花明,不觉得攀登的疲劳。听姜先生讲课是一种少有的享受。”

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,姜立夫将故乡的侄子、侄女接到天津,让他俩就读于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。中学毕业后,他们都考上南开大学数学系。侄女姜淑雁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获哈佛大学附属女校奖学金攻读硕士。

1934年,姜立夫到德国汉堡大学进修。恰巧他的两名高材生陈省身、吴大任正在那里留学。吴大任的妻子陈已同(亦姜立夫学生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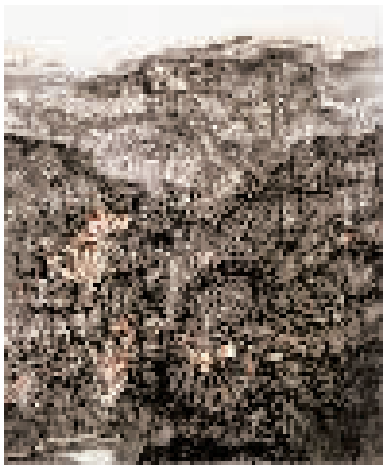
随丈夫也在此读书。姜淑雁于1936年夏完成学业,与未婚夫取道欧洲回国,特地到汉堡谒见叔父。姜立夫向他俩提出:既已订婚,为何不在旅途中结婚?如果结了婚,无论旅行或回国都比较方便。淑雁和未婚夫认为叔父言之有理。于是他们在汉堡中国领事馆举行婚礼,三个学生帮了不少忙。

学生们早就知道,姜先生少年时代已完婚,婚后不久妻子病故,而他一直未再婚。

新人离开汉堡后,陈已同对姜先生说:“淑雁都成家了,姜先生也该考虑自己的事情了吧?”姜先生用开玩笑的语气说:“你们不知道,我还有一个老情人!”三个学生大

为吃惊,不免想问个究竟。姜先生立刻变得严肃:“我说得太多了。”

1934年秋,姜立夫回国后与相识二十多年的女友胡芷华(胡明复之妹)举行了婚礼。此时学生们恍然大悟,原来姜先生为照料侄辈直到46岁才再婚。学界公认姜立夫为“圣人”。



蓟州一瞥 张晓璁

天津第一家拍卖企业为“茂盛拍卖行”。1902年开业,创办人是英国人瓦慈。

瓦慈早年随父亲来中国,父亲的工作是造船、修船;因此,他们家就住在天津大沽。成年后的瓦慈已经是个“中国通”了。

拍卖行的地点在维多利亚大街(解放北路)皇官饭店旁边。“茂盛”一开业就引起多方关注,人们纷纷登门洽谈。拍卖业务也是五花八门:像洋行的积压商品、银行的抵押物资、海关的罚没货物,等等。由于“茂盛”在天津是“蝎子粳粳——毒(独)一份”,所以它的业务异常火爆!

瓦慈十分讲究信誉。他的代理费规定在5%至10%

之间,从不超出这个范围;拍卖过后货款及时交给货主,从不拖欠。

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,瓦慈又赶上了机会,许多外国企业及外籍人士大量处理物品。尤其到了战后,中国政府将德国人和奥匈帝国人驱逐出境。这下,茂盛拍卖行更加热闹了,德、奥企业的货物,个人带不走的物品,都要处理、拍卖。瓦慈挣了个盆满钵溢。

市场在发展,“茂盛”不可能永远“一枝独秀”。瓦慈认为拍卖业的前景堪忧,他决定转行。1924年,瓦慈以3000两白银的价格将茂盛拍卖行转让,去了北京。此后,天津民国时期的拍卖行业即进入“战国”时代。

一个天气不错的下午,他们出发了。刘炳森不时地给二老介绍、讲解首都新建筑、新气象。他们还游览了久违的热闹的王府井大街。汽车缓缓穿过二环路,看着巍峨壮观的摩天大厦和新建的立交桥,桥上来来往往的汽车……笑容挂在了二老脸上。

回到家,刘炳森背着何老先生进屋。二老虽有些疲惫,但何老仍兴奋地说:“炳森啊,这一回,我死而无憾了!”何师母也笑着连声称谢:“谢谢,谢谢你炳森,炳森你受累了,想得这么周到、细致……”

1985年,何老先生、何师母先后仙逝。刘炳森坦言:“我是按照何先生教诲,没有急功近利、投机取巧,严格遵循何先生遗训……”是的,可以说,不管是做人做

锅饼,在天津的一些乡村叫糊饼。

锅饼比棒子饽饽好吃一些。做法虽简单,但做的时候却很忙乎:先把棒子面(或放了一点小麦粉的两掺面)里多加水,面糊和得比稠粥略稠些,再一下倒入锅里,然后快速地用铲子往锅壁上摊刮均匀。摊慢了不行——早沾了热锅的面快熟了,晚沾的还生着;这时,加柴继续烧火的话,很容易把早沾热锅的部分烧糊了。先把面摊开,然后烧火加热更不行——锅壁有弧度,面糊会往下溜。所以,快速摊刮面糊很重要,火烧得匀也很重要。

估摸着锅饼起“嘎儿”了,再撒点儿白糖或红糖。过上一会儿糖化了,再轻轻用铲子铲锅饼的边沿——这

时,就可以把一个锅状的锅饼取出来啦。

锅饼取出锅,或在饭桌上就菜吃,或掰下一块当作零食吃。

也有做咸锅饼的,其做法除了把少许的盐和切碎的菜揉入面里,其它的和做甜锅饼完全相同。

锅饼虽是家常饭,但因可以拿出家门,当着外人当零嘴儿吃。好脸面的,往往选择农闲时再做锅饼——好有耐心把火烧得不急不缓,把面糊摊得又薄又匀,那样做出来的锅饼才有把握“嘎儿”金黄,脆而不绵。谁家妇女做的锅饼凹凸不平,有了糊“嘎儿”,会让人笑话“拙娘儿们”。

随着烧柴的大锅渐渐消失,住在乡村的我,已经多年没见到锅饼了。

## 感念师恩

郭大光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刘炳森先生的恩师何二水老先生不幸患半身不遂,不管是肉体还是精神都陷入极端痛苦之中。当时,其生活上完全依赖何师母的照料。炳森先生亦时时刻刻挂念恩师。到了80年代初,社会面貌焕然一新,北京修建了二环路,又架起了不少立交桥,改革开放的成果初见端倪,令人振奋。刘炳森与何先生、何师母商量接他们感触一下北京新面貌,顺便散散心,二老欣然应允。

刘炳森请朋友帮忙借了一辆汽车,并求到一纸穿行王府井大街的特别通行证。在

事,还是写字,刘炳森先生都是按照何老先生的教导,认认真真、一丝不苟地去做。如此,刘炳森先生才有了巨大的成就。

刘炳森先生晚年,曾提议并负责编纂的《二水先生剩墨》,以纪念何先生。但是,刘炳森未能见到该书面世便与世长辞了。刘炳森的儿子曾说,这是父亲的一大憾事。

杨村一中退休女教师赵伯文,是刘炳森先生的小学音乐教师。1988年,学校党支部书记和赵伯文等人赴京找到刘炳森,请先生题写校名,先生欣然应允。一周后,刘炳森将写好的“武清杨村第一中学”亲自送到赵伯文老师家里。1996年,杨村一中迁新址并易名,刘炳森应邀再次题写“杨村第一中

学”,并为该校题写“诚信、严谨、求是、拓新”的校训。

刘炳森常对人说:“我会弹钢琴,得益于赵老师教会我脚踏风琴。赵老师是我永远的恩师。”从1988年伊始,刘炳森先生每年春节都要回杨村同赵老师一起过除夕夜,和老师一起聆听新春钟声,后来在事务冗繁的时候,即使除夕不能赶到,春节期间亦必到老师家中拜年。刘炳森还多次接赵老师到北京家中住,其间,在别人宴请刘炳森时,他都邀请赵老师一同前往,并让赵老师坐在宴会首席。其对老师的恭敬虔诚之态,在场者无不为之感动。

## 津沽文丛

记刘炳森先生之二

“撻地”“圆粘儿”的方法各式各样。相声艺人的艺术修养程度不同,使“圆粘儿”的水平存在着高低差异。在这方面,业内最令人佩服的还是张寿臣。

1943年,张寿臣由济南回到北京,决定去天桥“撻地”。对此,京津多家报纸予以报道:“昔日相声大王,今日又落明地。”他为什么谢绝诸多剧场之约而去“撻地”呢?究其原因,一是他对“明地”有一定感情;二是他想到自己的长辈刘德志(徐有禄的徒弟),还有同辈绪德贵(焦德海的徒弟)、刘桂田(周德山的徒弟)及晚辈王长友(赵蔼如的徒弟)、白全福、于世德等7人,他们的生活状况需要他帮一把。

当年“撻地”,每天下午五点多钟,大伙吃晚饭的时候“圆粘儿”最困难。用什么高招“拢粘儿”呢?张寿臣有能耐,仅举一例:一天,他刚“使”了一个很火的单口《三怪婿》,接场的是刘德志、绪德贵,张寿臣见观众听完欲走,就没有下场,而是待刘、绪上来后,拦住二人说:“你们老二先等会儿,看看今个儿的场子,咱的衣食父母可不少。你们今天得卖卖力气。”刘德志明白他的意思,自诩说:“这还用你说呀?各位老少爷们儿

就等着听我刘德志跟他绪德贵啦!”张寿臣说:“那我往哪摆?”刘德志一本正经:“有的是地儿,回了家,床底下,桌子底下,犄角旮旯,别熏人就行。”张寿臣翻“包袱儿”:“我是那臭袜子……既然各位是听你俩来的,刚才大伙怎么捧我,你们可都看见了。”绪德贵插话:“那还用您说呀?大伙要是觉得我们爷儿俩不行,我们就轱辘出这天桥。”张寿臣说:“这话可大点儿,从这轱辘出天桥,没俩仨钟头的,可出不去。各位今个儿算是来着啦,咱就看看他们二位是怎么轱辘出天桥的。”刘德志则以牙还牙,说:“你先等会儿,要是大伙捧我们爷儿俩,怎么办?”张寿臣用手指于世德,说:“我领着徒弟立马儿改行……”观众见三个人戾火、斗气儿,周围情绪也被调动起来了,跟着叫好几起哄,都想见证“刘德志轱辘出天桥”或“张寿臣师徒改行”,观众脚步被“钉”住了,纷纷留下看三人“斗法”。俗话说,有向灯的,也有向火的。左一段又一段,到了晚上,三人也没分出胜负。那天不仅演出效果好,收入也比往常多。观众后来才明白:“哦,我们全‘上当’啦!”

下篇咱讲天津两个“相声大本营”带动小剧场相声的发展。

## 也说捻船

王雅鸣

过去,在冬闲时节,渤海湾汉沽渔村的船坞上、码头上,到处可见捻船的情景。因为那是排船或修船工艺中十分重要的一环,用渔家人的行话就是“九叠十八捻”。那时,每条大船旁边,都会有一个火堆,上架上桐油锅,桐油在里边不住地咕嘟着,冒着一个个泡泡,弥散着一股特有的味道。新中国成立前,养船大户十分重视捻船这一传统工艺,捻船师傅都要从邻近的河北省河间、黑沿子一带聘请而来,但要求严,待遇高,日工给两升玉米。捻工不图你捻多快多长,每天只捻三尺活。虽说工钱高,出活慢,但从长远角度考虑,还是非常划算的。

这里所说的“九叠十八捻”,即一团麻在桐油

和腻子膏的浸淫下,捻工师傅利用手中的扁铲,叮叮当当嵌进船板中,最少要叠进九次,十八捻更是精雕细琢的代名词。

晚上收工时,船东用一把锥子验活,不合格辞退。这样捻出来的板缝,光滑如镜,锥扎不进。最后在整条船的板缝全部捻好后,再用一粒黄豆进行测试——黄豆被人吹着,沿着板缝从头滚到尾,不跳不脱,顺滑自然,这才叫绝活。

这样严苛的验收要求,是基于船东对在航行时如遇狂风巨浪的一种惧怕心理。海上运输大豆,一旦船舱进水,就可使豆子膨胀,导致胀坏了船板,造成“飘了”(渔民对海难的别称)。而经过“九叠十八捻”的船只,就会安然无恙,人船平安。

●曲坛逸事

## 张寿臣「圆粘儿」的能耐

孙福海